

# 國民主義：台灣地區 威權體制的政經轉型

蕭全政\*

## 摘要

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轉型，基本上涉及其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及其政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的改變，而且也不能獨立於外來政經環境與政經勢力的影響。因此，對於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分析與展望，決不能分割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而只分別觀照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或社會運動，也不能忽略外在政經環境或外來的政經影響。

過去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特色，表現於政府依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支配整體政經權力體系，且主導體制政經體制的合理化發展。這種深具國家主義精神的威權統治，固然有其重大貢獻，但也已面臨激烈的挑戰。

在同時兼顧國內外複雜政經網路下，本文指出：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最合理方向，將是國民主義的發展。國民主義強調由全體國民支配整體政經權力體系，並透過與之利害一致的「國民政府」之協助，而主導體制政經體制的合理化發展。

---

\* 蕭全政，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本論文初稿曾發表於民主基金會主辦“中國的民主前途：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 79 年 11 月 11, 12 日，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 一、導論

邁入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無論在國內或國際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都面臨巨大的變遷且遭遇激烈的挑戰。這些變遷與挑戰，一方面深切地影響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普遍地改變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

對於政府政策的改變及政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的發展，一般而言，政治學者都以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轉型來說明，並要求繼續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吳乃德，1989；Hu & Chu, 1989；Tien, 1989；Meaney, 1989；若林正文，1988）；經濟學者則批評過去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的不當，並要求繼續的經濟自由化（邢慕寰，1988；馬凱、林全和吳惠林，1990）；而社會學者則批判「宰制性國家機器」的僵化與無能，並希望以草根性社會運動進行社會改革，以重現社會的生機（蕭新煌等，1989；陳忠信，1989；杭之，1989；張景森，1989）。

近年來，尤其是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以後，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運動，都已普遍而廣泛的展開。但是最近已陸續出現不少「事與願違」的矛盾現象，例如報禁的解除顯然更強化兩大報系的壟斷，政治民主化改革更助長軍方對政府政策和民間事務的直接影響，經濟自由化也加速產業的空洞化，而各種社會運動，無論工運、農運、婦運、環保或無殼蝸牛運動，亦都在活動空間擴大後反而更加式微、沒落。面對這些矛盾現象，主張和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運動的學者與運動家們，最近似乎都紛紛表現出他們的無奈與無力感，最典型的例子，如胡佛教授毅然退出國是會議，吳惠林教授對王永慶海滄投資案給予「悲劇英雄」式的嘲諷（吳惠林，1990），和南方朔對可能出現「沈滯的社會」的憂心與吶喊（南方朔，1990）。

到底台灣的社會應該往那裡走？整個政治改革的方向應該定位在那裡？這都仍是我們必須深刻反省的課題。本文即嘗試從整體的角度，分析未來的政經發展趨勢及必要的改革方向。在進行實體分析之前，本文仍將先檢討學界中相關的一些理論和研究。

一般而言，承襲威權主義轉型模型（O'Donnell & Schmitter, 1986）而分析台灣經驗的政治學者們，通常都心存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分析台灣在保護基本人權和體現公民參政權以邁向參與式民主的過程中，在憲政體制、政黨與選舉等方面的改革過程和可能遭遇的難題（Hu & Chu, 1989；Jen, 1989；Tien, 1989；Cheng, 1989；Winckler, 1989；Lu, 1989；Meaney, 1989；Lui, 1989；若林正文，1988；Chou & Nathan 1987）。某些肯定社

會運動的學者也承受同樣的分析架構，並認為社會運動正能暴露威權體制所造成及累積的問題，且期待社會運動能瓦解威權體制並重組新的政經制度，以根本解決分配不均和經濟剝削現象（蕭新煌等，1989）。另外一些社會運動的支持者，亦希望透過草根性的社會運動，重建新的文化、倫理、制度與競賽規則（杭之，1989；張景森，1989）。相對地，主張經濟自由化的經濟學者則希望透過解除管制、民營化等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措施，降低政府的經濟干預，而儘量聽任市場運作（邢慕寰，1988；馬凱、林全和吳惠林，1990）。

任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是一種權力系統，而從長期而言，也都涉及該體制的經濟合理化過程（Elliot, 1984: 74；蕭全政，1988）。威權體制是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因此，它的出現、運作與轉型，也必然同時展現其權力系統與經濟合理化過程的特色；這些特色必然同時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不同層面。光復後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特色，除表現在以戒嚴法為中心而限制某些基本人權和公民參政權的政治層面外，還包括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管制與對人民團體的動員控制等經濟和社會層面；同時，為了整體政經體制的存續與發展，威權的政府又不斷採取反映內外需要且相應於權力系統特質的合理化措施，這些措施亦經常有其相應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層面。此外，威權體制又鑲鉗於國際政經網絡中，故其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權力系統和經濟合理化過程，又受到來自國際政經網絡的政經勢力影響。外來的政經勢力對於威權體制的權力系統和經濟合理化過程，可能具有強化、摧毀、改變或限制等不同的作用。

然而，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運動的學者們，基本上將威權體制的不同層面分開處理，因而割裂威權體制權力系統的整體性，且肢解整體政經體制的動態合理化過程。威權體制的不同層面，展現該體制的整體權力系統與經濟合理化過程在不同層面上的特質，而不同層面上的因素，經常在構成權力系統的全體與經濟合理化的動態過程中，相互存在著互剋互斥和共存共榮的複雜關係與變遷。不當的切割威權體制的不同層面，則無法將個別因素的重要性與限制妥當定位。例如主張勞工權益與勞工運動，假如不考慮政治與經濟層面的意義和限制，就難以拿捏其分寸，尤其在並行的經濟自由化潮流下，像目前一樣，勞運似乎加速資金外流，而將來更可能有勞務與貨品回銷，又將對勞工造成二度傷害。

其次，三種觀點都將威權轉型的問題視為是國內問題，而忽略國際政經潮流與政經勢力的影響。事實上，從光復以後，台灣地區的威權體制，無論是在其形成、運作或轉型的過程，都深受國際因素影響。無論是東西

對抗、南北對抗、和解或當前的新保護主義與經濟區域化，都對國內的威權體制之鞏固、運作、變遷、轉型產生深切影響，畢竟威權體制的權力系統與經濟合理化過程都無法孤立於國際政經網絡。

由於忽略或淡化國際政經網絡的影響，因此，第三，三種理論都將威權轉型視為是民間社會對政府的「奪權鬥爭」，其理想是使政府變成民間勢力的仲裁者，或執行民間意志的「工具」（此種「工具」說最明顯的表現於「國家機器」這樣的名詞）。威權體制的轉型的確是要去除威權政府的不當干預與控制，但却非要完全去除其干預與控制。過去的威權政府對台灣當今的國際孤立確實難辭其咎，但是面對當今的國際政經挑戰，却非解除威權政府的職能即可克竟全功；相對地，當威權政府都難以有效對抗外來政經壓力，那我們還能完全期待民間團體、地方自治、「沒有祖國觀念」的資本家，或無殼蝸牛運動嗎？威權政府要轉型，但決不是「工具化」，而是「輕薄短小」的更有效率，更有為化。目前威權政府的轉型，雖還談不上「輕薄短小」，但確已往有為化發展，這潮流正與前面所提三類學者與運動家的預期相反，而導致他們的無奈與無力感。

本文重點，在於分析當前國內威權體制轉型的趨勢，及未來的政經改革方向。在順序上，本文第二節將從國內外政經因素的互動中，探討光復後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形成、特質與發展；第三節將從所含政經體制的特質，及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申論國民主義將是威權轉型的最佳歸趨，其間亦將討論相關之政經改革意含；第四節是結論。

## 二、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特質與發展

威權主義，不管它最高的政治權力是由政黨、軍人、宗教領袖、官僚或君主所控制（呂亞力，1987: 161—167），也不管他被稱為現代化威權體制（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 regime）、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民粹式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軍事民粹主義（military populism）（Malloy, 1977: 3），或剛性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Winckler, 1984; 1989），它都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與支配。這種控制與支配關係，表現在政治上的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參政權的限制，在經濟上是對經濟活動與市場行為的管制與操縱，在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與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制，在文化上則是意識型態與傳播媒體的操控（Perlmutter, 1981）。

威權主義所隱含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與支配關係，形成於歷史過

程中，而且不斷在歷史過程中產生變遷。威權主義的最重要基礎是國家公權力，而國家公權力的有效發揮，則有賴政府所擁有或累積之政經權力足以化掉（neutralize）來自民間社會離心行為者的任何挑戰（Badie & Birnbaum, 1983: 34）。因此，威權體制所意謂的政府在整體政經體制權力系統中的支配性地位，顯然同時意謂著政府控制著相對於民間社會的支配性政經資源；假如政府所控制的政經資源，相對於民間社會而言，產生變化，則威權主義所隱含政府的控制與支配地位，亦將出現變遷，而有所謂威權主義轉型的問題。當然，政府所控制政經資源的相對多寡，深受國際政經結構與外來政經勢力影響；同時，整體政經體制的經濟合理化過程，亦將改變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相對政經資源關係。

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形成，始於光復後的對日接收，而民國三十八年的宣布戒嚴、恢復戰時體制，更使威權體制順理成章的發展。另一方面，二次戰後東西對抗、南北對抗及其變遷，亦對台灣地區的威權體制產生直接、間接的正面與負面性的影響。從土地改革、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十大建設，到經濟自由化等展現或影響威權體制特質的政策，無一不受國際政經潮流或政經勢力影響。

整體而言，從光復後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台灣地區的威權體制所展現的，是一種充滿國家主義特色的政經體制。這種國家主義的特色，表現在政府爲了國家安全與整體經濟的發展，不但控制對日接收的大量政經資源，又以戒嚴法和對市場採取管制、保護等措施，主導整體民間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種國家主義式政經體制的鞏固、發展、變遷，都深受國際政經趨勢影響。本節將依序討論二重點：其一，將分析威權體制在光復後的形成過程及其相關政策，並討論該等政策對民間社會的影響；其次，本節亦將討論二次戰後國際政經潮流，從東西對抗、南北對抗，到新保護主義，對國內威權體制的影響。

### (1) 威權體制的形成與發展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這個接收涉及中日兩國政府對台灣的管轄權及所有權的移轉。根據國民政府公布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係台灣省的最高行政機關。該公署係訓政時期的臨時組織，故其組織特質與各省政府略有不同。該條例第二條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布署令，并得制定台灣省單行法規」；第三條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之委任，得辦理中央行政。台灣省行政長官，對於台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a: 4-5）。行政長官公

署一開始顯然即以「威權政府」的姿態，完全承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管轄權與行政權。

在產業與財產的接收上，至一九四六年底，接收總值已達台幣 61 億多，其中包括土地 366,556 甲及企業 949 單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 83）。殖民政府所壟斷的鐵公路交通運輸、電話電報通訊系統，及獨占的菸、酒、樟腦等專賣事業，亦一併收歸國營或省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 2, 71-73, 217-237）。另外，又透過銀行的公營與貿易的壟斷，行政長官公署完全控制台灣的企業、金融與貿易。根據李國鼎先生的估計，公營企業在一九四六年的產值佔總工業產值的 59.7%；若加上公用事業，則其比率在一九四六年是 65.0%，而一九四九年是 72.5%（李國鼎，1976: 24, 31），這些龐大的公營企業和銀行體系，是行政長官公署非常重要的權力基礎。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上海淪陷直接促成戰時體制在台灣的復活。面對中共政權的挑戰，政府於當年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在戒嚴體制下，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標，在政治上，是維持內部安定、準備反攻大陸及贏取國際的支持；在經濟上，則是應付國內嚴重通貨膨脹壓力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因此，在政治上，政府除繼續貫徹一九四九年三月即開始的土地改革外，又加強社會治安的維護且耗費大量預算於國防經費上。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八年間，中央政府實際歲出中，平均約 75.0% 屬國防經費，其次是一般行政費用，平均約佔 9.4%（財政部，1967: 37）。而在經濟上，政府對內進行貨幣改革，且設立專責經濟計劃與管理單位，整頓國內經濟秩序，嚴格控制利率、物價、通貨發行與銀行貸款等；對外則採取進口管制、配額、外匯管制、高關稅及多元匯率等措施，體現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另外，政府又透過農會與工會系統，加強於農民與工人的社會控制與動員（Shiau, 1986；李允傑，1989）；而執政黨也透過黨、政、軍、青、特系統的改革與強化以鞏固政治權力。在戒嚴體制下，人民的基本人權受到限制，政治上的民主似乎僅限於定期舉行的地方性選舉；而在經濟上，政府容許市場價格機能自由運作的程度相當有限。這種種政治、經濟、社會上的特質，構成典型的「剛性威權主義」（Winckler, 1989: 7）。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以後，中共的威脅並沒有降低，因此，台灣地區強調政治與社會控制的戒嚴體系本質上仍無改變。但在經濟上為了刺激景氣並紓緩國際收支壓力，政府改採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容許局部的經濟自由化。政府除自一九五八年從事匯率改革並大幅貶值新台幣以利出口外，又在一九六〇年公布十九點財經措施及獎勵投資條例，全面性改革稅務、

解除管制、調整匯率，並提供鼓勵外銷的低利貸款、退稅，獎勵投資的免稅與結匯等（尹仲容，1960: 136-149; Jacoby, 1966: 129-149; C.Y.Lin, 1973: 74-107）。這種以鼓勵出口和獎勵投資為核心的經濟自由化，並不表示政府放棄對市場機能或民間經濟活動的干預，而只表示政府將以直接進行行政性管制為主體的政策，改為相當尊重市場機能但仍含政府干預的混合型財政、貨幣、貿易政策。為了整體經濟體系的充分就業、經濟成長與發展、貿易出超，政府仍執行隱含對市場進行強烈干預的凱因斯式保護政策。

一九七〇年代初，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等連串的外交挫敗，使我國陷入國際孤立的窘境；而七三年的石油危機，更使經濟不景氣惡化，且加速資金的外流，為了政治安全與經濟發展，政府仍堅持戒嚴，而只進行官僚體制本身的行政革新和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的局部政治民主化。另外，在國際方面，政府決定以經濟代替政治而維持與各國間實質關係，因而推動十大建設、成立外貿協會、招徠僑外資、發展策略性工業、開闢科學工業園區、加強中小企業融資、幫助企業進行研究發展工作等。像六〇年代一樣，除了各種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外，政府使用各種能促成充分就業、經濟發展與出口擴張的凱因斯式保護政策，影響國內經濟活動並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以確保整體政經體制的穩定與發展。

五〇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曾使民間經濟力穩定成長。一九五八年，民間企業的工業產值首度與公營企業平分秋色；以後，民營企業一直高於公營企業（CEPD, 1983: 81）。六〇年代的出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更使民間經濟力快速擴張，而有能力在七〇年代政府對外正式外交關係逐漸式微的國際孤立中，取代政府而推行以經濟代替政治的實質對外政策。公營企業的比重，曾在七〇年代因十大建設的推動而加強，但它們的角色或為支援整體經濟發展的基本建設，如交通、運輸，或為配合政府政策而支援民間企業發展的產業，如能源、石化、鋼鐵、造船，在對外關係上都不如民間企業。

相應於民間經濟力的擴張，國內民間社會亦在七〇年代初的外交挫敗中，普遍要求政治民主化，經濟、司法和其他的改革（Huang, 1976: 21-59）。七〇年代中期後，「台灣政論」、「夏潮」、「這一代」、「美麗島」、「八十年代」等政論性雜誌的出現，和鄉土文學論戰，更顯示民間社會已普遍從省籍權力分配、階級利益分配，及政經主體性等實際結構和意識型態層面，向威權體制挑戰。八〇年代後，逐漸興起的組織化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更使戒嚴體制下的威權政府因公能力、公信力與公

權力的次第低落與不彰，而須更張其政策並改變其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

## (2)國際政經潮流的變遷與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經局勢從東西對抗、南北對抗，到新保護主義與經濟區域化的發展，都對台灣地區的威權體制產生深切的影響。東西陣營間的對抗，使美援東來而進一步鞏固台灣的戒嚴體制，並使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能順利推展；而東西之間的「和平共存」，更促成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的發展。然而，東西之間的和解，加上南北對抗中達於高潮的石油危機，却迫使台灣必須獨力面對國際政經挑戰，而有局部的政經本土化政策的出現。另一方面，兩次石油危機嚴重改變國際經濟生態，促成新保護主義與經濟區域化的發展；後兩者又同時加速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國際化。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的爆發，使台灣的戰略地位頓形重要，而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前哨站，美國除積極支持我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又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間，提供約十五億美元的軍經援助，透過土地改革、農會改組、農技革新與推廣，美國幫助台灣重塑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而透過小麥、棉花援助，輔導公營公司移轉民營，幫助重建基本設施與基本工業，美援團幫助我國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蕭全政，1984：35-54）。

一九五七年後，美蘇和解，強調以經濟發展代替軍事競爭的和平共存。甘乃迪總統更提議將一九六〇年代稱為「發展年代」（the Development Decade），以重構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強調經濟發展或經濟援助，事實上即希望將之納入新的國際分工體系。美國為使台灣成為經濟發展中國家的「典範」（showcase），願進一步提供經援，但以台灣進行必要的財經改革為要件。經過多方的協商，終有一九六〇年十九點財經措施與獎勵投資條例的公布，而加速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蕭全政，1989：63-75）。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發表關島宣言（the Guam Doctrine），宣布越戰越南化，並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一九七一年七月，宣布將訪問中國大陸以尋求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大陸；三月，英國與中共聯合聲明提昇其外交關係為大使級，並關閉淡水英國領事館；九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訪問大陸，與中共建交並斷絕與我國外交關係。尼克森的政策性改變，意謂著台灣在東西對抗中的策略性地位即將喪失，也意謂著美國將改變其在聯合國中對台灣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國退出聯合國；英國與日本的行為，更使台灣驟然陷入國際的孤立。



一九五〇年代，美國爲了圍堵共產主義擴張，曾給某些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軍經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而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爲了重構國際分工體系，亦普遍給予較先進發展中國家各種軍經援助與優惠。兩個時期美國所援助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威權統治的國家；爲了政治上有效防止共產主義滲透、顛覆，和軍事上有效對抗其入侵，前時期固然需要威權統治；爲了經濟穩定和經濟發展以確保美國多國公司和其國民的利益，後時期亦需要威權統治，才能降低人民政治參與、抑制勞工等社會運動，並提供各種有效經濟誘因。這類的威權統治，相對而言，不太需要仰賴國內人民的支持；只要美國支持，它們即能在國際政經領域中擁有一席之地。六〇年代的朴正熙、馬可仕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政權都是如此，台灣也不例外。但是一旦美國撤回了它們的支持，這類國家很少不動盪不安的，除非其威權政府能在短期內贏得國內的政治正統性（political legitimacy）。從此觀點看，蔣經國總統的政經政策很具突創性：透過政治民主化，他贏得人民的政治支持；透過政府經濟職能的強化，他結合民間經濟力，而在國際孤立、國旗不被承認的年代，推動「國旗跟著貿易走」的實質外交策略，以打破過去「貿易跟著國旗走」的消極且逐漸陷入困境的僵局。

一九七三年以來的兩次石油危機，對台灣除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等立即影響外，又因改變全球經濟生態而對台灣造成全面性與長期的壓力。石油危機使大量跨國公司的資金與技術流往工資低廉的國家，對台灣產生強大的競爭壓力；石油危機也直接促成已開發國家新保護主義和經濟區域化的發展，轉而要求台灣降低關稅與非關稅障礙，進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

石油危機深切影響歐美各國的經濟成長。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歐洲共同市場經不斷擴大而包含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並宣稱將於一九九二年由十二會員國取消相互貿易壁壘，統一貨幣及各種規章，協調各種立法與稅收，而爲真正的共同市場。相對地，美國亦在一九八二年提出加勒比海計劃，一九八三年與以色列簽訂美以自由貿易區協定，一九八八年與加拿大簽訂美加自由貿易區協定，而希望統合整個美洲地區。另外，自一九七九年後，日本與澳洲亦積極推動亞太經濟合作，而於一九八〇年成立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一九八九年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the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三個主要集團似乎完全瓜分全球經濟體系。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後，歐美新保護主義即逐漸增強，在平衡雙方貿易

的名義下，我政府自一九七八年元月，即開始進行對美特別採購。一九八〇年後，雷根政府採取高利率、高幣值的美元政策，不但導致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外債危機，也使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擴大；繼而對台灣要求加強大宗物資與公共工程的對美採購。一九八四年，美國修正公布其貿易與關稅法案（the Trade and Tariffs Act of 1984），要求普遍化優惠關稅（the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的受惠國，必須開放市場、保護美國智慧財產權，並保障勞工權益（李佩珊，1990:115～125）。八五年一月該法案生效，中美間之經貿摩擦加劇，而召開各類經貿諮商談判。美國經常以三〇一條款的報復和優惠關稅的取消，逼使政府大幅降低關稅、開放商品市場與銀行、保險、運輸等投資機會，且要求工具機與紡織品的自動設限、新台幣升值，及解除外匯管制等。

美國的新保護主義不但促成台灣的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也加速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美國利用台灣對其經濟的高度依賴，透過雙邊談判而要求台灣開放市場且升值新台幣，導致台灣經濟秩序紊亂。為分散對美市場依賴，但又面臨日本的非關稅障礙與歐洲的保護主義下，我國民間只能要求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貿管制，以拓展東歐、蘇聯和大陸的市場，並加強對美國、東南亞與大陸的投資。另一方面，民間更要求政府將公營企業移轉民營，並制訂公平交易法，以剷除國內經濟特權。另外，自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後，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亦逐漸以人權的關懷為由，而聲援國內的政治反對運動，透過各種聽證會與各國狀況報導（Country Reports），國會與國務院在八〇年代後對國內的戒嚴批評特別厲害（C. Lin, 1990）。八四年的貿易與關稅法案對於工運更有鼓勵與助長的效果，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對國內政治反對運動的長期接觸與支持，事實上是促成八六年民進黨成立，及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保護主義者何以一反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的態度，而在要求新興工業化國家進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同時，又支持其政治民主化？自一九六〇年代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快速發展，都有賴政治上的威權統治與經濟上的新重商主義（蕭全政，1989; Haggard, 1983）。七〇年代中期後的美國新保護主義要能有所斬獲，必然首先要面對這些政府間的衝突，要求它們採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措施；其次，即對這些國家的民間社會提供一支持多元主義（pluralism）的體制，即透過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以增加其能結盟的民間伙伴並弱化工具國家主義傾向的威權政府。這層內在關係，不僅使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自七〇年代中期後即關心國內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也見諸於八〇年代中期後菲律賓與南韓政治民主化過程，更曾

引起李光耀政權和美國間關係的緊張。同樣的這種潮流，也使國內政治反對運動、工會運動及經濟自由化運動者，幾乎從不批評來自美國，甚或來自日本的外來干涉行爲。

### 三、國民主義——未來的政經改革方向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美國新保護主義與國內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都要求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政治民主化，而迫使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轉型，但是一九八七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相關的政經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更形複雜：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引發執政黨內主流與非主流之爭；憲政改革帶來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衝突，及立法院內派系對立與議事功能的癱瘓；大陸探親與間接經貿開放，導致統獨之爭、資金外流與勞資關係的改變；而人團法的實行，却更使社會運動沒落。另外，國際政經局勢的最新發展，更使我們倍受壓力：在政治上，中沙斷交，中共與沙烏地、印尼、新加坡的建交，南韓與北韓、外共改善關係並和蘇聯建交，都使我們在國際上更形孤立，而且增加競爭壓力，而中共反對一國兩府、反對一國兩地區，也反對台灣在一九九八年主辦亞運，而一味要封殺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霸道作法，更使我們困難重重；在經濟上，新保護主義仍然強勁，而且我們仍被排除於正式的國際組織與主要的經濟集團之外。在政治上，台灣似是一個「亞細亞的孤兒」；而在經濟上，則似是一個「國際的浪民」。整體而言，台灣地區的威權轉型所須解決的問題是，在國際上，發展良性的對外政經關係；在國內，重整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良性政經關係與互動模式。

政經體制是個權力系統，它包括政府、政黨、利益團體、選民、生產者、消費者、勞工、資本家等間的權力關係和互動模式；而從動態角度看，政經體制要能長期存在與發展，各相關團體或個人之關係與互動，必須不斷配合內外政經環境的變化與需要，進行最適關係與互動模式的合理化調整，因此，政經體制亦是一種經濟合理化過程。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轉型，事實上即涉及整體政經體制權力系統的動態經濟合理化過程。其中，政府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它是政治與經濟體制最重要的交集，且是兩權力系統中享有最高權力者，而對整體政經體制的經濟合理化過程亦最能發揮作用，因為它可以統合國內的不同政經勢力，且化解它們間的衝突，並可結合或代表國內的整體政經體制，對抗外來的政經勢力，或對外追求最大利益。

當前國內政經混亂的根源，在於外來新保護主義所誘導或助長而不當

發展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及新國際政經局勢所產生的壓力。新國際政經局勢，無論是全球的經濟區域化或東北亞的國際關係轉變，都進一步壓縮我們在國際孤立下的政經生存空間，而影響整體政經體制的順利運作與發展。另一方面，美國壓力所直接、間接促成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更已明顯割裂我國政經體制的整體性，而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國內陸續出現代表外來勢力的壓力團體即是典型例子，如菸酒進口商之不利於公賣局、全體國民，農產、大宗物資進口商之不利於國內農業都是。而經濟自由化所造成的資金、技術往東南亞和大陸的不當外流，也顯然已對本土產業升級造成壓力，將來產品回銷更會造成二度傷害。更糟的是，這些外流的資金與技術，尤其是往大陸者，已在國內造成壓力團體，甚至已將其代言人送入國會，所以我們看到工商界領袖及立法委員們爭相求寵於北京途中。在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下，當前的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事實上也可能造成「政治的國際化」和台灣的香港化，因為政治民主化將使代表外來政經利益的團體取得合法地位，進一步零細化台灣的政經主體性和整體性。

當前台灣地區威權轉型的最大弊病，在於本質上屬外導型的（external-induced）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已使整體政經體制喪失其主體性，並割裂其整體性。過去在威權統治時代，此政經體制的主體性與整體性，完全仰賴威權政府為中心的國家主義來維繫並整合；但是，威權統治在內外政經衝擊下瓦解後，此政經體制的主體性與整體性的維持，已無法再仰賴國家主義，而須依靠以整體國民為中心的國民主義。國家主義是以政府為中心，主導整體國家的安全和經濟的發展；而國民主義是以整體國民為中心，由國民主導整體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成長。國民主義所表現與所要求的，是在經濟上建立榮枯一體的國民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建立體現國民主權的國民政治體制，而使政府能在政策制訂的過程與目標中，反映整體國民的意志、需要和利益，實現真正的「國民政府」。以國民主義為中心的政經體制，將是化解當前內外政經危機的最合理化整體調整方向。

國民主義政經體制的特質，及其對於當前政經合理化調整的意義，可從國民經濟體制、國民政治體制，及國民的政府等三方面進一步討論。

### (1) 國民經濟體制

國民經濟體制的要點，在於強調整個經濟體制的存在與發展是以照顧全體國民的生活和生計為目的，而且其經濟活動的內容和方向須由反映全體國民利益的民間來主導。其基本精神，一方面，在於強調特定疆域上全

體國民經濟利害的榮枯一體化，以化解國內各種社會團體間的衝突，並降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與經濟特權的保障，以提昇整體經濟資源的有效運用；另一方面，則希望因而強化經濟主體性，以便有效對抗外來經濟入侵，或對外進行擴張。

在威權體制時代，政府爲了它本身的政經控制能力，曾保有大量的公營企業及銀行體系，而且執政黨爲了籠絡地方派系及其自身利益，更授予各地方派系及其自身各種客運、瓦斯、合作社、證券融資、保險等壟斷性行業的特許經營（朱雲漢，1989:139-160）。這些公營企業及經濟特權，基本上並不受到市場價格機能的檢定與制衡，完全依賴特權爲生，不但扭曲整體經濟資源的誤用，而且經常必須由國民全體承擔其經營上的缺失和無效率。基於全體國民的利益考慮，這些特權領域必須儘量的開放給民間社會，透過經濟自由化而提昇其經濟效率。

任何經濟的選擇，很少不在帶來微笑的同時，也帶來眼淚；亦即任何經濟的政策或投資，很少不在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帶來壞處。例如對資本家有利的，可能不利於勞工或環保人士；對生產者有利的，可能不利於消費者或一般大眾。國民經濟體制所強調的榮枯一體性，即希望讓當事人或其代表能透過溝通、談判、妥協，使全部的利害關係人都能共同分享或分攤任何經濟選擇所帶來的利益與成本。其中，政府所一貫強調的「受益者付費」固是重要原則，而「受害者補償」亦不能被忽略。五輕模式可能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國民經濟體制所強調的主體性與整體性，對於新保護主義和經濟區域化的潮流，以及處理兩岸經貿關係，亦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國際政經局勢益趨孤立的今天，「國旗跟著貿易走」仍將是無可避免的局面，台灣的對外經貿關係仍必須由民間來主導，政府僅能居於協助的地位。但是政府將如何界定其協助性角色？在中美經貿諮商談判中，如何決定那些該讓步？那些該堅持？對外投資應該分佈在那些國家或地區？應該限於那些產業？國民經濟體制的主體性與整體性，即考慮整體國民經濟的利益，都可以對上述問題提供一個較爲明確的判準。尤其，儘管因產業上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異，資本家的經營邏輯本質上就沒有「祖國」的概念隱含其中，因而可能爲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當的移轉資金、技術，而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國際的競爭市場是血淋淋的，根本容不得人性或道德兩個字，它只管成本與利潤的高低，假如資本家經營不下去，亦將透過對就業、所得、稅收等之影響而左右國民經濟的盛衰。在此其間，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顯然又是政府拿捏其協助性角色的重要基礎。

## (2)國民政治體制

相對於國民經濟體制的強調經濟一體性，國民政治體制的要點，在於體現國民主權，以為國民經濟體制的政治基礎，並使政府的產生和運作，都能反映整體國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而非代表少數個人、團體或政黨。國民政治體制具有雙重的特別意義：其一，可化解國內目前的重大政治、社會紛爭；其次是可整合被割裂的政治主體性和完整性，這對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更是重要。

自從解嚴以後，從地方到中央，從民間到政府的各種政治衝突，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其關鍵在於過去威權體制所隱含不對等的權力分配關係及蔓生的政治特權，並不因為戒嚴的解除而獲得普遍的改善。威權體制強調中央的集權，因而有人事、主計、警政的一條鞭化和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威權體制強調行政、司法、教育的工具性，因而有行政、司法的不獨立，及教育的教條化；威權體制強調政府的主導性，因而有軍方、情治系統的專權化，執政黨、中央民意代表和其共棲結構的特權化，以及一般人民團體和民間社會政治參與的被阻隔。解嚴後至今，這些代表威權體制的結構本質上仍未更動，這是導致各種政治紛擾的根源，也是影響將來國民經濟體制能否有效運作的決定性因素。

根據蕭新煌教授的研究，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台灣地區出現至少十七種政治、社會運動，這些運動絕大部分都以政府為衝突對象，而要求重新釐定政府與民間社會間較為公平、合理的政經關係（Hsiao, 1989）。這種紛擾的現象，並不因戒嚴的解除而改善，因為殘留的戒嚴體制和戡亂體制仍與真正的民主體制大有扞格，以致於仍存在很多政經權力與政經結構不連結的部分，加上外來的政經挑戰與壓力，終而加速政府公能力的弱化、公信力的式微與公權力的不彰；同時，也導致國民經濟體制的停滯與蕭條。政府若要建立健全的國民經濟體制，或要重振它的公權力，都必須加強政治民主化，讓各民間團體都能積極參與政策決定過程，以取得政治正統性。

另外，自去年二月以來，以總統、副總統的選舉、行政院長繼任人選、國是會議的召開、憲政改革的推動，及國家統一委員會的設立等，而誘發的票選與起立之爭、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省籍之爭、甚至統獨之爭等等，顯然已深切地影響台灣地區的政經發展與政經穩定。事實上，執政的國民黨黨內民主也好，不民主也罷，國民大會主導修憲也好，立法院主導也罷，真正的政治正統性都決定於全體國民。而目前的整體國民，不分省籍黨派，一到中國大陸手拿的都是台胞證；面對美國的經貿制裁時，亦沒有省籍黨派之分。另一方面，主張統的固然可以在文化上、感情上認同大陸，而在生

活上却不能不認同台灣，主張獨的更不用說。因此，無論統獨或獨台，無論省籍，也無論黨派，都可以從確保台灣地區國民意識的一致性與整體性中，找到他們的利益與理由。然而在威權體制鬆解後，唯有全民參與的國民政治體制，才能確保此國民意識的一致性與整體性；而事實上也只有國民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化解上列的各種衝突，並抵擋外來的政經割裂，以確保國民經濟的一體性。

### (3)國民的政府

國民主義主張全體國民為政經體制的主體，並主導整體政經體制的發展，却不在於弱化政府的公能力、公信力與公權力；相反的，它將要求能體現國民主權的政府，積極作為而推動整體國民政經體制的合理發展，使各種政策都能隨時反映全體國民的意志、需要和利益，也使政府變成真正的國民政府，而與民間社會的利害關係一體化。

自大陸時期，我們的政府即稱「國民政府」，但那是軍政、訓政時期「國民黨政府」的遺留（所以英文是 Nationalist government，而非 National government）。真正的「國民政府」強調政府與其統轄國民間利害關係的一體性：政府的成立、運作與變遷，都在反映全體國民的意志、需要與利益。「國民政府」的概念有其絕對性的一面，也有其相對性的一面。在絕對性的意義上，「國民政府」強調政府與其所統轄特定疆域上的所有國民間之治權與政權關係；在相對性意義上，「國民政府」可能因為其統轄疆域的擴大或縮小，而產生相對的變化，只要它還能維持政府與其統轄國民間之政權與治權關係。因此，從絕對性的意義看，中共不承認「一國兩府」和「一國兩地區」，並不妨礙國內兩千萬人為了整體的安全和長期的發展而成立真正的「國民政府」；而從相對性的意義看，兩千萬人成立了「國民政府」，並不表示即關閉了兩岸統一的大門。就像東西德從分立到統一的過程所顯示的，在兩國改善關係以前，分立的兩個政府都不可能把對方的國民需要和利益列入施政的考慮，但這並不妨礙兩個「國民政府」在國民的支持下合而為一，甚至在未來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的政經整合過程中，我們也不能排除統一德國的「國民政府」與其他歐洲「國民政府」間相互合併的可能性，但是其間仍絕對不變的是「國民政府」與其統轄國民間的一對一關係。

國民主義強調全體國民的主導性，却同時要求其政府不能弱化萎縮，或退化無能。「國民政府」是個積極有為的政府，其有為程度甚至可能超過威權的政府，譬如在對外關係上，我們一向強調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因此很多駐外單位的主要工作都是在辦「內交」，即國內各主管單位的對外

訪問、交際，而非辦理真正的外交，所以很多駐外人員可以不用通曉當地語言，不用深入當地社會，尤其在東西對抗的時代，我們可以相對地只管西方陣營的事務，而東方陣營則只要對抗到底，尤其所謂只管西方陣營的事務事實上也只要管與美國的關係，其他「大、小朋友」的關係都可透過美國而解決。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要求「全方位化」的外交，無論東西陣營、南北陣營，也無論「大、小朋友」，一切都須自己招呼，所以政府也須更積極有為。另外，在國內層次，政府要如何才能建立國民經濟的一體性，如何化解國內的政經衝突，如何幫助國民經濟抵抗外來的經濟入侵，或對外擴張，這都要求政府提昇其政策制訂與政策執行的能力。

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不必然是一個「臃腫」的政府，它可以是「輕薄短小」而且非常有效率，我們的政府因為負載太多威權統治時期的職權和功能，因而顯得笨重而顛預。當前的憲政改革，中央行政體制的重整，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公營企業民營化，軍隊、司法與情治系統國家化等，事實上都是重建積極有為的「國民政府」的必要措施。國民主義可以為這些改革確立邏輯一貫的基本精神，並重建其公能力、公信力與公權力。

#### 四、結論

任何威權體制的特性，都不僅表現在政治層面上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威權支配性；這種威權支配性亦表現在經濟與社會層面上，而形成政府對民間社會在整體政經權力系統與權力關係上的威權支配性。威權體制的轉型，可能因為內部政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的改變而觸動，也可能因為外在政經關係的更迭而引發，更可能因兩者之內外互動而推展。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轉型，基本上涉及其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及其政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的改變，而且也不能獨立於外來政經環境與政經勢力的影響。因此，對於台灣地區威權轉型的分析與展望，決不能分割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而只分別重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或社會運動，也不能忽略外在政經環境或外來的政經影響。

過去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特色，表現於政府依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支配整體政經權力系統，且主導整體政經體制的合理化發展。這種深具國家主義精神的威權統治，在東西對抗仍稱強烈的一九七〇年代前並沒有發生嚴重問題，甚至還帶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但是一九七〇年代初後東西陣營的和解，直接促成台灣的國際孤立，也使威權政府必須透過局部的政經「本土化」，以改善內部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一九八〇年代，國際上新保護主義與經濟區域化的興起，及國內政經關係的發展，都



迫使威權的政府必須進行更大幅度的政經改革，並調整其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了；但這只是大幅度改革的開始，不是結束。內外政經壓力已顯然造成政府公權力和公能力的式微、不振；更造成整體政經體制的割裂與失序。

台灣地區的威權體制必須轉型，但是不能只分別討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或社會運動。威權體制的轉型，必然同時涉及整體政經體制和政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的整體調整，也涉及整體政經體制與國際政經網絡間的關係。本文國民主義的立論，即希望能在同時兼顧內外複雜政經網絡的情況下，指出台灣地區威權轉型的最合理方向。國民主義強調由全體國民支配整體政經權力體系，並透過與之利害一致的「國民政府」之協助，而主導整體政經體制的合理化發展。其間，整體政經體制必須統合內部的衝突，以重建政經整體性和主體性，才能有效對抗外來政經入侵，或對外進行擴張；而當威權的政府逐漸鬆解，且面對國際政經孤立，或甚至強烈的國際政經壓力下，只有體現國民主權和經濟一體化的國民經濟體制，才能使政府重新獲得有效的政治正統性，以整合內部衝突，並進行合理化發展。唯有統合於國民主義的大前提之下，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社會運動三者間，才能釐清相互的分際與共同連帶，也才能有效化解當前內外政經危機。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 尹仲容 1960。我對台灣經濟的看法，續編。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再版。台北：行政院經設會。
- 朱雲漢 1989。「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煌等編，1989，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李允傑 1989。台灣地區工會政策之結構性分析，1950-1984。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佩珊 1990。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之政治經濟分析。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國鼎 1976。「台灣民營工業的成長」。杜文田編，1976，台灣工業發展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13-48。
- 邢慕寰 1988。「趁早拋棄『新重商主義』的包袱」。工商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二版與四版。

- 呂亞力 1987。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
- 吳乃德 1989。不確定的民主未來：解釋台灣政治自由化的現象。時報文化基金會主辦，中國民主前途研討會。台北。
- 吳惠林 1990。「王永慶是否想當悲劇英雄？」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十版。
- 杭之 1989。「社會運動之本質：一個概念性的反省」。中國論壇，29卷5期（第341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版）。頁39-43。
- 南方朔 1990。「台灣正在走向『壓迫性的容忍』」。中時晚報，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日。
- 若林正丈 1988。「政治體制的轉捩點」。若林正丈編，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公司。頁1-95。
- 財政部 1967。中華民國五十六年財政統計提要。台北。
- 馬凱、林全和吳惠林 1990。台灣經濟何處去。台北：卓越出版社。
- 陳忠信 1989。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張景森 1990。「地方政府、民衆組織與地方計劃：九〇年代規劃的政治經濟學」。蕭全政編，國土規劃的挑戰，民間國建會特輯五。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1946a。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月來工作概要。台北。  
—— 1946b。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台北。
- 蕭全政 1984。台灣地區稻米政策之結構性分析，1945~1973。中國政治學會七十三年年年會學術研討會。台北。  
—— 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1989。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蕭新煌等 1989。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二、英文部分：

- 
- Badie, Bertrand and Pierre Birnbaum. 1983. *The Sociology of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EPD,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83.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Executive Yuan. R.O.C.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Kuomintang Regim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 Taipei.
- Chou, Yangsun and Andrew J. Nathan. 1987.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27, No.3: 277-299.
- Elliott, John E. 1984. "The Institutionalist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avid Whynes, ed., 1984,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59-89.
- Haggard, Stephan Mark. 1983. *Path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89. *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i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Hu, Fu and Yun-han Chu. 1989.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Huang, Mab. 1976. *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 1971-1973*.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28.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Jacoby, Neil H. 1966. *U.S. Aid to Taiwa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Jen, Teh-hou. 1989.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Lin, Cheng-Yi. 1990. *The U.S. Factor i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1979-1989*.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U.S.-R.O.C. Relations since 1979: Reviews and Prospects,"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 Academia Sinica, January 4-6, 1990. Taipei.
- Lin, Ching-Yuan. 1973.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1946-72: Trade and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Lu, Ya-li. 1989.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Lui, Fei-lung. 1989.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Mallory, James M. 1977.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Modal Pattern." In James M. Malloy, ed., 1977,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p.3–19.
-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1989.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KM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Amos. 1981.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iau, Chyuan-Jenq. 1986. "Th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ol.34:465–487.
- Tien, Hung-mao. 1989.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aiwan'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Winckler, Edwin A.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481–499.
- . 1989. *Taiwan Politics in the 1990s: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9-11, 1989. Taipei.

# The Societal Nation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Chyuan-Jenq Shiau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has been virtual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y, econom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ivi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political-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forces. In the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us, one should not pay attention to only on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or social movement, nor to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ed external political-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forces.

The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war Taiwa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dominated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directed the economizing processes of the whole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uthoritarian rule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state nationalism has its contribution, but also has confronted great difficulties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 its transformation.

To tak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economic factors together into accou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societal nationalism will be the most reasonable future of the authoritarian transformation. The societal nationalism emphasizes that the nationals as a whole dominate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direct the economizing process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national” state.